

〈送報伏〉在中國： 《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 與楊逵小說的接受

柳書琴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中文摘要

楊逵的小說〈新聞配達夫〉(中文譯名〈送報伏〉)，是台灣文學史上首先發表於日本文學雜誌的小說，也是第一篇以中文和世界語被譯介到中國的台灣小說。它於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受到禁止，為突破封鎖投稿日本，打開了台日左翼作家的交流，繼而被胡風介紹到中國，又於戰後初期台灣與省外作家交流上起過重要作用，在左翼文學交流史上極為重要。從〈新聞配達夫(前篇)〉到〈送報伏〉胡風譯本，銘刻一部殖民地小說在東亞旅行的過程。本文以版本與文藝接受脈絡的考察為方法，分析流通於台、日、中的〈送報伏〉在中國場域的接受情況，並藉由中、日文壇不同接受脈絡的釐清，理解楊逵在東亞左翼文化走廊中扮演的角色。筆者將以〈新聞配達夫(前篇)〉(初刊版)、〈新聞配達夫〉(全篇版)和〈送報伏〉胡風譯本(胡風版)三種最早版本為對象，首先探討這篇小說在台灣的原初發表背景；其次考察胡風譯本出現於《世界知識》、《弱小民族小說選》、《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的脈絡；最後說明三〇年代上

海盛行的弱小民族文學譯介風潮，如何影響了中國文壇對台灣左翼小說的接受與詮釋。

關鍵詞：楊逵、胡風、〈送報伕〉、〈新聞配達夫〉、《山靈》、《弱小民族小說選》、左翼文化走廊

“Newspaper Man” in China:
The Reception of *Mountain Spirits*:
Selected Short Stories from Korea
and Taiwan and Yang Kui’s Short Story

Liu, Shu-qi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Yang Kui’s short story “Newspaper Man”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exchange of left-wing literature, for it is not only the first short story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a magazine of Japanese literature, but also the first Taiwanese short story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Esperanto and introduced to China. The course from “Shimbun Haitatsu Fu (Prequel)” to “Newspaper Man” translated by Hu Feng inscribes the journey in East Asia taken by a short story of the colon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ception of “Newspaper Man” in China, a short story circulated in Taiwan, Japan, and China, by investigating the contexts of editions and literary reception and scrutinizes the role Yang Kui played in the left-wing corridor in East Asia by examining different reception contexts in the literary circles in China and Japan. Focusing on the three earliest editions, “Shimbun Haitatsu Fu

(Prequel)” (first edition), “Shimbun Haitatsu Fu” (full edition), and “Newspaper Man” translated by Hu Feng (Hu Feng’s edition), I first explore the background of this short story when it was originally released in Taiwan; next, I examine the contexts when the edition translated by Hu Feng appeared in *World Knowledge*, *Selected Short Stories from Minor Cultures*, and *Mountain Spirits: Selected Short Stories from Korea and Taiwan*; finally, I explain how the trend of translating minor literatures prevalent in Shanghai in the 1930s influenced the rece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aiwan left-wing short stories in the literary circle in China.

Key words: Yang Kui, Hu Feng, “Newspaper Man,” *Mountain Spirits*, *Selected Short Stories from Minor Cultures*, left-wing corridor

〈送報伕〉在中國： 《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 與楊逵小說的接受*

一、前言

楊逵（本名楊貴，1906-1985）的小說〈新聞配達夫〉（中文譯名〈送報伕〉），是日刊《台灣新民報》刊載的第二篇日文小說、台灣文學史上首先發表於日本文學雜誌的小說，也是第一篇被以中文和世界語譯介到中國的台灣小說。它於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受到禁止，為突破封鎖投稿日本，打開了台灣作家與日本左翼文壇的交流，繼而被曾留日的胡風介紹到中國，戰後初期這部中譯本又在台灣與省外作家交流上起過重要作用¹。因此，在討論台、中、日的左翼文學交流史上，〈送報伕〉是極重要、也極戲劇性的一篇作品。

堪稱台灣文學經典之一的〈送報伕〉，包括1932年〈新聞配達夫（前篇）〉（台灣新民報日文版）、1934年〈新聞配達夫〉（文學評論日文版）、1935年〈送報伕〉（胡風《世界知識》中譯版）、1946／1947年楊逵重刊之胡風譯本（中日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東亞左翼文化走廊與台灣左翼文學：台灣、日本、中國、『滿洲國』的連線（1927-1937）」（計畫編號：MOST 102-2410-H-007-062-MY3）之部分成果，謹此誌謝。此外，本文撰寫期間感謝聯合大學台灣語文與傳播學系黃惠禎教授接受請益並惠借文獻，同時銘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給予多項重要指正。

¹ 參見朱雙一，〈光復初期台灣文壇的胡風影響〉，《安徽大學學報》第4期（2012年7月），頁10-19。

對照)，以及七〇年代楊逵以胡風譯本為基礎重新分節、改寫、復原的〈送報伙〉《鵝媽媽出嫁》版、遠景版等多種版本和譯本（參見附表一）。

〈送報伙〉由於受到台灣總督府言論檢閱體制壓迫，在台、日、中三地的文藝接受情況長期存在隔閡。就日文版而言，戰前島內讀者只讀見前半篇，東京刊載的全篇禁止輸入；就中文版而言，台灣讀者直到光復後才讀到胡風譯本，而它又與七〇年代楊逵將日治時期無法寫出的內容添寫而成的「復原版」不同。塚本照和早於 1983 年便針對 1932 年到七〇年代的版本進行釐清，呼籲注意殖民地小說進入後殖民時期後，在民主化及主體重建的新脈絡下出現的改寫現象及其對小說評價產生的影響²。《楊逵全集》主編彭小妍更透過手稿比對，標示《文學評論》版遭日本警調刪除部分及胡風版推測部分，對理解戰前版之變動助益極大³。

從〈新聞配達夫（前篇）〉到〈送報伙〉胡風譯本，銘刻一部殖民地小說在東亞旅行的過程。本文聚焦戰前，以版本變異與作品接受的考察為方法，關心這部小說在討論較少的中國場域之接受情況。亦即探討目前在華文讀書市場上流通最廣的胡風譯本出現於怎樣的脈絡，與日文版接受脈絡有何不同，這個差異如何有助於我們理解楊逵在東亞左翼文化走廊中的角色及策略。

筆者將以〈新聞配達夫（前篇）〉（初刊版）、〈新聞配達夫〉（全篇版）和〈送報伙〉胡風譯本（胡風版）三種最早版本為分析對象，首先探討這篇小說在台灣的原初發表背景；其次考察胡風譯本出現於《世界知識》、《弱小民族小說選》、《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簡稱《山靈》）的脈絡；最後說明三〇年代盛行的弱小民族文學譯介風潮，如何影響了台灣左翼小說在中國的接受與詮釋。

² 參見塚本照和著，向陽譯，〈楊逵作品「新聞配達夫」、〈送報伙〉的版本之謎〉，收於黃惠禎編，《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4·楊逵》（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 年 3 月），頁 221-234。

³ 參見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 4 卷（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1998 年 6 月），頁 102-104。

二、〈新聞配達夫〉前篇到全篇：一部突破殖民地言論封鎖線的小說

1932年5月19日開始，〈新聞配達夫（前篇）〉經由《台灣新民報》副刊編輯賴和選錄，分8回刊載，到5月27日刊完，每期附有黑白插圖一禎，以出生台灣農村的主人公「我」在東京報館打工遭受剝削的經過，以及日籍同事田中君對我的扶持為主要情節⁴。前篇刊完後，楊逵於6月1日完成後篇。〈後篇〉敘述「我」的故鄉遭受糖廠壓迫，農村凋落，家破人亡，母親臨死前遺言交代留在東京奮鬥，但我決定返鄉參與第一線抗爭。後篇未通過檢閱，因此未獲刊載。河原功推測其以普羅文學形式進行總督府糖業政策批判，因此遭「示達」或「警告」方式禁止⁵。

台灣讀者直到殖民統治結束都沒有機會讀到後篇，而《台灣新民報》2008年才出土，前篇也一直未被戰後讀者注意。事實上，現存後篇日文手稿，並非6月1日完成者，而是1934年楊逵向日本投稿時，整併前、後篇完成的新底本⁶，以下從兩方面說明〈前篇〉的發表背景及意義。

（一）、〈新聞配達夫（前篇）〉是首次以「楊逵」筆名發表的作品，也是具有**敏感媒體意識的楊貴以文藝運動實踐社會運動的轉捩點：**

〈前篇〉寫於1932年，此時楊貴已失去政治運動舞台，台灣左派運動亦已解體。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發生第一次分裂，右翼另組合法組織台灣民眾黨，並握有文協機關報《台灣新民報》，左翼則在取得文協領導權後，另發行《台灣大眾時報》作為宣揚刊物。該報因無法獲得總督府許可，在東京發行再輸入台

⁴ 參見楊肇嘉捐贈，李承機主編，《日刊台灣新民報創始初期（1932.4.15-5.31）》（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08年），數位光碟。

⁵ 根據河原功考察，當時對於新聞記事的禁刊有三種處置：第一，違反禁刊內容逕行禁止發行的「示達」；第二，視社會情勢及記事手法決定是否禁止發行的「警告」；第三，不施以發行禁止處分，但訴諸報社自覺、不鼓勵刊載的「懇談」。參見河原功著，張文薰譯，〈不見天日十二年的〈送報伙〉：力搏台灣總督府言論統制之楊逵〉，《台灣文學學報》第7期（2005年12月），頁134。

⁶ 〈後篇〉日文手稿原件，1998年經《楊逵全集》收錄後公諸於世。該手稿雖名為〈新聞配達夫（後篇）〉，但同時包含前篇內容，經筆者比對，內容與《文學評論》刊出版內容一致。參見國立台灣文學館，「楊逵文物數位博物館」（來源：<http://dig.nmtl.gov.tw/yang/index.php>，2016年4月27日）。

灣，由中間人物王敏川擔任編輯部主任，結合翁澤生等「上海大學派」中共黨員、「東京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日共黨員，以及文協左派，組成具有台、中、日左翼運動經歷的聯合陣線。在代表文協第一次左傾後的聲音的《台灣大眾時報》中，賴和、楊貴擔任台灣區特約記者，此時的楊貴還是一位社會運動者。

1928年，包括拂下地爭議、竹林爭議、小作爭議、蔗農爭議在內不斷湧現的台灣全島性農民運動和罷工事件，使左傾人士普遍持有台灣階級鬥爭形勢日趨樂觀的看法。該年5月18日發行的《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號上，賴和發表了隱喻台灣革命路線分裂、左翼路線凌駕啟蒙路線奮勇前進的散文——〈前進〉，楊貴也以〈當面的國際情勢〉發表一篇評論。1927年應蓬勃的台灣農民組合號召返台的楊貴，起初對日本無產階級革命充滿樂觀⁷。然而，隨著世界經濟大恐慌，革命形勢樂觀論日益抬頭，主張帝國主義即將崩潰的「資本主義第三期理論」盛行，導致1929年新文協再次左傾⁸；新文協領導權被台共掌握後，持社會主義路線的連溫卿及楊貴遭到驅逐。不久後，代表文協第二次左傾後激進立場的《新台灣大眾時報》創刊，〈台灣農民組合當面的任務〉一文中，出現了對連、楊的批判，楊達開始被邊緣化。

以「台灣農民組合」機關立場發表的這篇宣告指出，依據1930年2月及6月農組中央委員的研判，日本經濟大恐慌勢必導致政府對農工彈壓強化，激化台灣農民運動，導致革命加速到來，因此台灣機會主義者、托洛斯基主義者、楊達、連溫卿一派，主張台灣資本主義尚稱安定、暫可放棄鬥爭而鑽研理論……等見解，根本為誤謬⁹。綜合研判，農組因路線差異，早自1928年4月起，激

⁷ 他認為，不論從日／英帝國主義對中國工人運動的干涉、歐洲無產階級大眾的左傾或世界各殖民地的民族獨立運動，皆顯示資本主義列強和蘇聯之間的緊張關係正在加劇。日本為壓制中國和圍堵蘇聯，勢必與美英合作，但又因在華利益和太平洋問題與英美有深刻矛盾。國際矛盾不斷激化國內矛盾，使日本國內階級鬥爭的客觀條件日益成熟，他預期日本國內的無產階級在國際革命上將擔負重任。參見楊貴，〈當面的國際情勢〉，《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號（東京：大眾時報社，1928年5月），頁12。

⁸ 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中提出的「資本主義第三期理論」，把1928年視為資本主義總危機急劇發展的開端，認為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崩潰現象即將發生。關於「資本主義第三期理論」如何對台灣民族運動與左翼運動產生影響，可參見趙勳達，〈蔣渭水的左傾之道（1930-1931）：論共產國際「資本主義第三期」理論對蔣渭水的啟發〉，《臺灣文學研究》第4期（2013年6月），頁129-165。

⁹ 台灣農民組合，〈台灣農民組合當面的任務〉，收於大眾時報社編，《新台灣大眾時報：1卷1期—2卷4期》（台北：南天書局，1995年），頁6。

進之簡吉一派即對楊、連展開鬥爭¹⁰。楊貴到 1931 年間遭農組和新文協左派批判，促使他逐漸將社運實踐轉寓於文學，終於誕生了〈新聞配達夫〉這樣具有社會抗爭意識的作品。

根據黃惠禎的研究，楊貴留學日本期間（1924-1927），就因參加佐佐木孝丸主持的演劇研究會，結識秋田雨雀等普羅文學作家，開始投稿《號外》，並透過《文藝戰線》等雜誌吸收無產階級文藝理論，1928 年《戰旗》創刊後，已經回台的他也熱心閱讀著左翼書刊¹¹。根據河原功的考察，〈新聞配達夫〉實為楊逵在 1927 年發表於東京記者聯盟機關誌《號外》上的處女作〈自由労働者の生活断面：どうすれあ餓死しねえんだ？〉¹²之後續作品，受到日本左翼作家伊藤永之介小說〈總督府模範竹林〉和〈平地蕃人〉啟發¹³。楊逵將主人公設計為一位送報伏，顯然為回應當時《號外》創刊號〈一個送報伏的疑問〉的短文及第三號〈被魴魷魚的小工〉的卷頭言¹⁴。

綜合上述兩項研究可知，楊逵密集關注日本左翼媒體、借鑑日本進步作家的台灣題材作品、特別是涉及總督府政策批判的小說，嘗試以文學為媒介響應日、台兩地重大社會爭議。他以普羅文藝擴大農運議題，引入日本勞農階級抗爭資訊，而非以極左立場進行地下抗爭。〈新聞配達夫〉就是他認為革命時機未到、須以文化形式廣泛研究與傳播左翼運動現狀的一次實踐。他非急進的態度，招致極左陣營批判和除名。小說創作是他失去社會運動領導地位後，轉向文化領域前進的新行動方案，幸運獲得了賴和的支持。誠如陳芳明所言「楊逵脫離政治運動後，才開始涉入文學活動；他的啟蒙老師正是賴和。」¹⁵賴和從 1930

¹⁰ 同註 9，頁 8。

¹¹ 參見黃惠禎，《楊逵及其作品研究》（台北：麥田出版社，1994 年），頁 76-77。本文寫作過程中，承蒙黃惠禎教授多次惠予疑難討論和文獻參考，謹此致謝。

¹² 楊貴，〈自由労働者の生活断面：どうすれあ餓死しねえんだ？〉，《號外》1 卷 3 期（1927 年 9 月），頁 43-47。葉笛譯，彭小妍等校譯，〈自由労働者之生活断面：怎麼辦才不會餓死呢？〉，同註 3，頁 1-18。

¹³ 參見河原功，〈楊逵「新聞配達夫」の成立背景：楊逵「自由労働者の生活断面」と伊藤永之介「總督府模範竹林」「平地蕃人」から〉，《翻弄された台湾文学》（東京：研文出版社，2009 年），頁 19-42。

¹⁴ 同註 5，頁 138-139。

¹⁵ 陳芳明，〈《台灣大眾時報》與《新台灣大眾時報》解題〉，收於大眾時報社編，《台灣大眾時報》（台北：南天書局，1995 年），頁 5。

年3月擔任週刊《台灣新民報》文藝欄編輯開始，就積極利用文藝欄傳遞中、日進步文藝訊息，他本人也利用現代詩〈流離曲〉(1930)、小說〈豐作〉(1932)批判總督府的土地政策和糖業政策¹⁶。〈前篇〉的刊出使楊達一舉成名，也使抗議台灣總督府政策的作品在編輯者的提掖下成為進步作家之間的一股風尚。

(二)、〈新聞配達夫(前篇)〉是《台灣新民報》發行日刊後，日文文藝欄上第二篇帶有激進色彩的小說，它的被禁顯示該報日文文藝欄激進立場的受挫：

1932年1月《台灣新民報》獲准發行日刊，4月15日問世，以中文為主體、日文約占三分之一。報社總部設於台北市，另在東京、大阪、上海、廈門及台灣重點城市設立13個分社。日刊發行最初，編輯局下分設整理、政治、經濟、通信、學藝、調查六部，學藝部長由整理部長黃周兼任，下設林攀龍、賴和、陳滿盈、謝星樓四位編輯員，在第七或八版設置中文文藝欄，第六版設置日文文藝欄。賴和對〈送報伙〉的重視，不只是對作品本身的肯定，還寄寓了他對終於發行日刊的《台灣新民報》文藝欄的願景。

截至該刊現存的1932年5月31日為止，文藝欄繼續延續新民報週刊時期轉介中國新文藝、日本左翼文學動向的傳統，日文欄也大膽採用了林理基的〈島の子たち〉(〈島之子〉)(1932年4月18日-5月17日)和楊達的〈新聞配達夫〉(〈送報伙〉)(1932年5月19日-5月27日)等批判性強烈的小說。雖然兩篇於連載中途遭禁，但編輯群最初的激進立場清楚可見。總督府透過禁刊彰顯其檢閱尺度之後，《台灣新民報》從1932年7月左右改弦更張，開始推動「以大眾小說為形式，台灣現實為內容」的「台灣式的新聞小說」¹⁷。過去以台灣喉舌及進步文藝為特色的週刊《台灣新民報》，在升格日刊後保守化、變成大眾小說的園地，造成不少讀者失望，並招致文化界非議¹⁸。換言之，〈前篇〉猶如《台灣新民報》日文文藝欄刊載尺度的試金石，它被禁象徵了文藝欄進步路線的受挫¹⁹。

¹⁶ 陳芳明，〈賴和與台灣左翼文學系譜〉，《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略》(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頁50-58。

¹⁷ 參見柳書琴，〈滿洲內在化與島都書寫：林輝焜《命運難違》的滿洲匿影及其潛話語〉，《台灣文學研究》第2期(2012年6月)，頁133-190。

¹⁸ 參見柳書琴，〈『台灣新民報』の右転回：頼慶と新民報日刊初期のモダン化文芸欄〉，《言語社会》第7期(東京：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2013年3月)，頁28-46。

¹⁹ 這樣的結果改變了1920年代以來《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文藝欄領導文壇的生態，

根據河原功的考察，〈前篇〉被禁兩年後的 1934 年春天，楊逵看見《文學評論》雜誌的徵文啟示，才將前後篇合併修改，寄往東京，高中二獎（首獎從缺），成為首位登上日本文壇的台灣作家。1934 年 10 月，作品全篇發表於《文學評論》1 卷 8 號。不料台灣總督府再次禁止該期雜誌在台銷售，連續封鎖激化了楊逵，使他傳播該小說、批判總督府的決心更為熾烈。他化名偽裝，撰寫評論和迴響，化整為零，將小說梗概與訴求介紹給島內讀者，甚至刻意引發論戰使它一再被討論²⁰。

經過筆者比對，台灣新民報初刊版與文學評論全篇版前半部變動不大，以文句修飾與細節調整為（參見附表二）。不過，有兩處變動必須注意：第一，〈前篇〉第 6 回，主人公開始送報時與田中的同事關係，在文評版中被加筆為朋友和扶持者關係。第二，〈前篇〉第 6、7 回交接處，增加一段送報伏因不堪業績逼迫、保證金被沒收，不惜虛報訂戶，自己承擔「幽靈讀者」報費的職場變態現象。這些改寫突顯了田中的先行者形象、送報伏們的共同困境，呼應結尾日本送報伏們對主人公的支持，也使無產階級跨國提攜的特性清楚呈現。換言之，楊逵最初以台灣讀者為對象，著重於解析資本主義壓迫和殖民主義剝削的共謀性，亦即透過故事闡明「為何送報伏會上鉤？」、「為何超時工作者還欠老闆債？」等機制。他以畸形化的內地微末產業對一位殖民地移工的壓迫作伏筆，揭示日本財團和總督府聯手在台灣進行農地占奪和經濟榨取之更大場面。然而，投稿日本時楊逵進一步認識到台灣文壇附屬於日本文壇、日語體制下的位置，考量內地評審及讀者的期待，因此把重點擴大到資本主義無分帝國與殖民地的剝削本質，以及無產階級跨國、跨民族提攜的迫切性。

〈新聞配達夫〉透過境外刊行、解體回流、跨國翻譯等策略與契機，使被禁作品起死回生並擴大議題效應，其過程刻劃了一部台灣小說衝撞總督府言論封鎖線的軌跡。不論對正值轉型期的楊逵或當時的台灣文壇，〈新聞配達夫（前篇）〉都有重要意義。

刺激不滿者創立藝社群，台灣文壇從此進入了文學雜誌為文壇核心的新時期。

²⁰ 同註 5，頁 129-148。

三、《世界知識》雜誌「弱小民族名家作品」：〈送報伕〉翻譯到中國的背景

〈送報伕〉的旅行不止於日、台之間，更擴及中國。1935年6月和8月〈送報伕〉及朝鮮作家張赫宙的〈山靈〉譯文，先後刊載於《世界知識》²¹，1936年4月被收錄於胡風譯《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5月再版，直到1948年第3版、1951年第5版、1952年第7版，多次重印，在中國相當普及²²。1936年5月〈送報伕〉、〈山靈〉另外被收錄於世界知識社編《弱小民族小說選》（上海：生活出版社），1937年3月再版。因此，〈新聞配達夫〉不僅是楊逵的成名作，也是台／日／中左翼文學交流史上的一篇重要作品，而胡風譯本比日文原作或戰後楊逵復原本流通更廣，是目前影響力最大的一個版本。以下，本節將針對〈送報伕〉在中國的翻譯經過及背景加以介紹。

1985年3月12日楊逵在台過世，同月30日在北京舉行了一個紀念會。未曾謀面的胡風抱病出席紀念會，以「悼楊逵先生」為題致辭提到：「30年代初，我在日本的普羅文學上讀到了楊逵先生的中篇小說《送報伕》。……這篇作品深深的感動了我，我當即譯了出來，發表在當時銷數很大的《世界知識》上。後來，新文字研究會還把它譯成了拉丁化新文字本，介紹給中國的工友們閱讀。」²³此外，胡風也翻譯了1935年1月第二篇刊載於《文學評論》的台灣作家呂赫若小說〈牛車〉。

張禹（王思翔）曾言：「楊逵當時只聽說〈送報伕〉被介紹到祖國大陸，卻不知道譯者是誰，也不了解其他情況。」、「在胡風先生這一邊，情況也是如此。當時他對於整個台灣的文學運動，對於楊逵這一位作家，也不可能有較多的了解。他只能從一些日本報刊中接觸到若干台灣作家的作品，不消說是很有有限的。」²⁴他認為胡風的選文過程充滿偶然性，筆者則不認為如此。

²¹ 參見楊逵，〈送報伕〉，《世界知識》2卷6期（1935年6月），頁42-53。

²² 《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第1版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第3版藏於中國國圖、台灣大學圖書館，第5版藏於復旦大學，第7版藏於上海市圖。

²³ 張禹，〈楊逵·《送報伕》·胡風：一些資料和說明〉，《新文學史料》第4期（1987年11月），頁84-88。筆者曾經調查新文字研究會相關出版物，但尚無所收獲。

²⁴ 同註23，頁84。張禹為浙江人，戰後初期短暫旅台，曾與楊逵共同在台中擔任《和平日

首先，下村作次郎曾指出，胡風於 1927 年赴日，1933 年在慶應大學就讀期間，因接觸日本無產階級文學、成立新興文化研究會、組織抗日宣傳被捕，拘禁三個月後遭強制遣返。這一段經歷使回國後受到魯迅等左聯作家倚重的他，在嚮應左聯作家所推動的世界弱小民族議題之際，特別關注日本左翼文壇的思想資源，而此時正好值遇楊逵在日本文壇登場²⁵。其次，許多研究者都已曾指出，《山靈》出版半年後楊逵已掌握消息。1936 年 8 月發行的《台灣新文學》1 卷 7 號的「消息通」專欄，刊出胡風譯編《山靈》並收有楊逵〈新聞配達夫〉的訊息²⁶，1936 年 11 月發行的《台灣新文學》1 卷 9 號再度登載《山靈》的廣告，標明為「胡風譯」，到 1937 年 5 月之間又刊了三次，次數頻繁遠超越其他書目²⁷。最後，筆者認為，《山靈》卷末附錄的楊華白話文小說〈薄命〉也是一個證據。該小說原刊於 1935 年 3 月《台灣文藝》2 卷 3 號，時值「台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剛成立，與「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東京分盟」開始交流之際。在 1935 年春到 1936 年秋之間，旅居東京的台灣作家以日本左翼文壇與演劇界為中介，與旅居東京的中國作家多所交流，形成了以東京和上海為兩軸的「東亞左翼文化走廊」²⁸。〈薄命〉證明胡風除了直接從《文學評論》雜誌取得〈送報伏〉、〈牛車〉之外，也可能因為與積極推廣台灣文學的「文聯東京支部」有聯繫，而掌握這份在島內發行、被廣泛推薦給日、中左翼人士的雜誌及其作品。中國左聯東京分盟的成員雷石榆、魏晉等人，透過吳坤煌、張文環等活躍者的

報》編輯。

²⁵ 下村作次郎著，邱振瑞譯，《從文學讀台灣》（台北：前衛出版社，1997 年），頁 9-10。

²⁶ 無署名，〈消息通〉，《台灣新文學》1 卷 7 期（1936 年 8 月），頁 62。原刊登訊息如下：「胡風氏譯編短篇小說集『山靈』，收錄張赫宙氏的『山靈』、李北鳴氏的『初陣』、楊逵氏的『新聞配達夫』、呂赫若氏的『牛車』等，於中國讀書界頗博好評。」

²⁷ 參見許俊雅，〈關於胡風翻譯《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的幾個問題〉，《文學台灣》第 47 期（2003 年 7 月），頁 8；以及，黃惠禎，〈楊逵與賴和的文學因緣〉，《台灣文學學報》第 3 期（2002 年 12 月），頁 161。

²⁸ 1930 年代的東京和上海，是東北亞屬一屬二的國際都市，它們同時也是中、日兩國國內外異議份子的薈萃之地。由於兩國政府從 1927 到 1936 年間，強勢打壓國內共產主義及左翼運動，引發海外出走潮，因此出現了中國異議份子向上海集結，又向東京出走，東京異議份子向上海出走，或赴中國尋求合作的流動現象。這種借重國際都市文化空間，帶有政治流亡或國際結盟意味，出現於特殊背景下的左翼文學藝術通道，筆者稱之為「左翼文化走廊」。參見拙論〈台灣作家吳坤煌：日本語創作の國際的ストラテジ〉，《バイリンガル日本語文學——多言語多文化のあいだ》（東京：三元社，2013 年），頁 246-274。

爭取，曾出席文聯東京支部聚會，對《台灣文藝》十分熟悉，甚至曾評論台灣作家的作品²⁹。

胡風致辭中泛指的「普羅文學」(プロレタリア文学)，具體為日本ナウカ社發行的《文學評論》雜誌。胡風為魯迅任教於北大時期的弟子，1929年赴日，1933年因在東京組織左翼抗日文化團體、參加日本反戰同盟，以反日赤化分子罪名被逮捕，7月和十幾位留學生遭到驅逐，返回上海時被當作愛國學生歡迎，之後擔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宣傳部長，數月後接替茅盾擔任左聯書記。到1936年春的三年期間，他與魯迅頻繁接觸，根據魯迅日記記載兩人往來次數達121次之多³⁰，此時期的翻譯工作深受魯迅啟發。

1933年創刊的《文學》雖以商業性雜誌宣稱，在左翼文學譯介上卻不遺餘力。魯迅則於1934年9月與茅盾、黎烈文等人創立《譯文》月刊，專門譯介外國文學。受到魯迅影響，這些雜誌相繼在弱小民族文學的翻譯上投下心力。1936年5月18日《山靈》出版次月，胡風也親自造訪魯迅贈書³¹。

胡風響應魯迅開始了少數民族文學的翻譯工作，他選擇東亞鄰近地域非母語寫作者的日語文學為譯介對象，這樣的視野在當時卻不多見，台灣日語文學尤其罕被注意，而他的實踐場域《世界知識》和《譯文》同屬生活書店發行，也是左翼刊物。根據胡風在《山靈》〈序〉中所言：

這些作品底開始翻譯，說起來只是由於一個偶然的運會。去年世界知識雜誌分期譯載弱小民族的小說的時候，我想到了東方的朝鮮台灣，想到了他們底文學作品現在正應該介紹給中國讀者，因而把〈送報伙〉譯好

²⁹ 雷石榆曾言：「《台灣文藝》這本雜誌我翻了，但沒有全部看完。我很敬佩各位的努力。台灣現在的文藝雜誌跟以往不同，有新的意識，立場也不限於台灣，需要跟中國合作，事實也在互相合作前進。」參見無署名，〈台灣文聯東京支部第一回茶會〉，《台灣文藝》2卷4期（1935年4月），頁27。魏晉也曾言，「承吳君的盛意，我像在夢中似的，讀到了《台灣文藝》。」參見魏晉，〈最近中國文壇上的大眾語〉，《台灣文藝》2卷7期（1935年7月），頁193-194。相關討論，亦可參見柳書琴，〈臺灣文學的邊緣戰鬥：跨域左翼文學運動中的旅日作家〉，《臺灣文學研究叢刊》第3期（2007年5月），頁51-84。

³⁰ 周正章，《笑談俱往：魯迅、胡風、周揚及其他》（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頁151-152。

³¹ 同註30，頁154。

投去。想不到它卻得到了讀者底熱烈的感動和友人們底歡喜，於是又譯了一篇〈山靈〉，同時也就起了收集材料，編譯成書的意思。³²

翻查《世界知識》可以發現，現存 2 卷 2 號到 6 號每月推出一篇翻譯小說，依序為印度、捷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的作家，其中第五位、也是該特輯第一位被譯介的東亞作家就是楊逵。然而，由於 7 月到 12 月間的卷期遺佚，因此《山靈》收錄的〈山靈〉、〈上墳去的男子〉、〈初陣〉、〈聲〉、〈送報佚〉、〈牛車〉等六篇，除了許俊雅指出〈山靈〉載於《世界知識》2 卷 10 號³³、黃惠禎指出〈牛車〉載於《譯文》³⁴，以及筆者發現〈初陣〉亦刊於《譯文》之外，其它譯文是否在集結前先行刊載已無可查考³⁵。進一步比對 1936 年 5 月出版的《弱小民族小說選》，可以確定其它小說皆未曾於《世界知識》刊載，這些佚作為來自阿爾及爾（Algiers）、烏克蘭、波蘭、希臘、愛爾蘭、阿拉伯等作家的小說（附表三）。綜上可知，《世界知識》經由伍實、黎烈文、孫用、徐懋庸、胡風等譯者，推出「弱小民族名家作品」，〈送報佚〉是胡風為響應這個特輯推出的第一篇翻譯作品。它和〈山靈〉先被《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收錄，隸屬黃源主編的《譯文叢刊》之四³⁶，次月又被《弱小民族小說選》收錄，成為茅盾主編的「世界知識叢書」之二³⁷。

³² 胡風，〈序〉，《山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年），頁 I。

³³ 許俊雅，〈關於胡風翻譯『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的幾個問題〉，《文學台灣》第 47 期（2003 年 7 月），頁 11。

³⁴ 楊逵曾於其主編的《台灣新文學》上介紹〈牛車〉在中國刊載的消息，茲翻譯如下：「一九三五年在新年號的《文學評論》上揭載的本島作品呂赫若君的〈牛車〉，已刊載於中國的雜誌《譯文》終刊號。」參見無署名，〈消息通〉，《台灣新文學》1 卷 1 期（1935 年 12 月），頁 64。筆者調查《譯文》，但因 1935 年 9 月到 12 月散佚，故不見應刊載於 12 月的〈牛車〉。

³⁵ 根據「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庫」可知，〈初陣〉中譯本最早發表於《譯文》1 卷 1 期（1936 年 1 月，上海雜誌公司），但該誌 1935 年 9 月到 12 月散佚，1936 年 1 到 4 月各卷尚存，未見〈聲〉與〈上墳去的男子〉，因此不知兩篇是否曾刊載。使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檢索他刊，同樣未見。

³⁶ 黃源（1906-2003），1928 年赴東京留學時結識流亡中的茅盾，開始投入革命文學活動。1929 年回上海後從事翻譯與編輯工作。1934 年初，魯迅和茅盾、黎烈文發起創辦《譯文》，茅盾推薦黃源參加編輯工作，第四期起魯迅提議把編輯工作全部交給黃源，《譯文》成為左翼文化界的重要據點之一，1936 年黃源又代替魯迅主編《譯文叢書》。《譯文叢刊》於抗戰爆發後改由巴金主編，是一套規模宏大的世界文學名著叢書，共收 53 種。有計劃地向讀者介紹外國文學名著，受到好評，曾不斷再版。參見上海魯迅紀念館編，《黃源文集》第 1、2 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 年），頁 1-4。

³⁷ 世界知識社編，《弱小民族小說選·輯二》（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社，1936 年）。

《世界知識》是一份國際政治經濟動向分析雜誌，弱小民族名家作品特輯為有關海外文學的重要翻譯企劃。〈送報伏〉發表於此、被收錄為「世界知識叢書」，那麼這份雜誌所標榜的「世界知識」為何，又為何與少數民族議題有關呢？

《世界知識》，由上海的世界知識雜誌社發行。根據創刊元老及資深編輯張明養的回憶，它由上海「蘇聯之友社」部分成員創立，自創刊起就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展工作。創辦人胡愈之於1933年入黨，以特別黨員身份直接與中央單線聯繫，其他一些創辦人和撰稿者不是黨員就是進步文化人士。1933年他們「期望以馬列主義觀點，描述和分析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用具體事實，說明資本帝國主義的崩潰和必然坍塌，被壓迫民族奮起反抗及其前途，說明社會主義蘇聯的物質文化建設的突飛猛進，遠超過帝國主義，今後條條道路通向社會主義」³⁸，經過數月籌備，於1934年9月正式發刊。

《世界知識》迄今仍在發行，將近80年的發行期可概分為五階段。最初階段從1934年9月創刊到1937年11月上海淪陷為止，在國民黨政府出版檢查嚴厲的上海發行，透過馬列主義觀點分析國際形勢、宣傳抗日主張並介紹國際知識，是發行部數持續上升、影響力不斷擴大的一個時期³⁹。由胡愈之起草的創刊詞表明了嚮往社會主義新世界的這群人，以世界情勢剖析和海外進步知識引介，聯結被壓迫民族抵抗帝國主義的宗旨：

中國是「世界的中國」了；資本帝國主義的「文明世界」大廈，行將倒塌；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已出現另一個與「文明世界」相對峙的新的世界；占全世界人口半數以上的被壓迫民族已成為促進「世界文明」的主要動力。

我們的後面是墳墓，我們的前面是整個的世界。怎樣走上這世界的光明大道去，這需要勇氣，需要毅力，但尤其需要知識。⁴⁰

³⁸ 社員有胡愈之、金仲華、錢亦石、曹亮、張仲實、沈志遠、畢雲程、張明養、王紀元、章乃器等十餘人，張明養，〈《世界知識》創刊初期的戰鬥歷程：祝《世界知識》創刊55周年〉，《世界知識》第18期（1989年5月），頁2。

³⁹ 同註38，頁5。

⁴⁰ 同註38，頁2-4。底線為筆者所加。

為了增加中國人民對陌生的被壓迫民族的認識，該雜誌於 1935 年 2 卷 1 期中宣告：「在這一卷裏，打算專門介紹弱小民族的名家作品，每期一篇，盡可能範圍附加插圖」⁴¹，〈送報伏〉和〈山靈〉就在這種構想下出現了。

胡愈之特別撰文闡述「少數民族」的概念，揭示它與世界大勢之關係：

少數民族的西文是 Minorities。雖然少數民族早已存在，但是這個名辭卻在從大戰以後，方纔普遍行用的。原來現代的國家，除了美國蘇聯等由許多民族結合的國家以外，大部分是由單一的民族結合成一個國家。每一民族都有獨特的種族，宗教或言語。但在一個國家內，往往有少數的人民，種族，宗教或語言和所屬國家內大多數人民不同。這少數的人民自成一種民族，所以舊稱做少數民族。比方捷克斯洛伐克是一個斯拉夫民族國家，可是國內卻有許多操德意志語的日爾曼民族。德國是日耳曼族的基督教國家，可是其中百分之一的人口，卻是信奉希伯來教的猶太人。因此這些日耳曼人和猶太人便是「少數民族」。⁴²

他還指出，一戰後歐洲新興國家內部都有許多少數民族，為使其順服必須保障種族、宗教、言語方面的權利，因此 1919 年以波蘭為首，有關弱小民族的國際條約相繼在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希臘簽訂⁴³。然而，原本簽訂少數民族條約只是帝國主義分割領土方便，並非真要解決民族問題，因此只有新興小國和戰敗國才遵守，對強國無約束力⁴⁴。故而，當第一個締約的波蘭在德國策動下解除條約後，少數民族制度便被根本推翻，中歐、東歐重新燃起民族疆界的紛爭，「波蘭竟成了德國的代言者」，少數民族條約的爭辯只不過是「法德一場外交惡鬥」⁴⁵。

⁴¹ 無署名，〈編輯室〉，《世界知識》2 卷 1 期（1935 年 1 月），頁 22。

⁴² 胡愈之，〈少數民族問題〉，《世界知識》1 卷 2 期（1934 年 10 月），頁 70。

⁴³ 當時最重要的少數民族保護條約為：1. 波蘭（1919 年 6 月 28 日簽訂）；2. 南斯拉夫（1919 年 9 月 10 日簽訂）；3. 捷克斯洛伐克（1919 年 9 月 10 日簽訂）；4. （1919 年 12 月 9 日簽訂）；5. 希臘（1920 年 8 月 10 日簽訂）。同註 42，頁 71。

⁴⁴ 同註 42，頁 71。

⁴⁵ 同註 42，頁 73。

綜上可見，Minorities 一詞盛行於一戰以後，與帝國主義的領土擴張有關，並因列強對新興小國的操縱成為政治敏感議題。三〇年代隨著軍國主義的抬頭，少數民族問題被打壓為內政問題，又演變為列強對峙與製造衝突時的籌碼。中國進步人士一方面以文學讀物提高國人對世界大勢的關心，另一方面也以弱小民族文學批判法西斯主義，並作為政治隱喻，宣傳反蔣抗日，傳達他們對國際政治的判斷和國內政治的主張⁴⁶。不論是《文學》、《譯文》或《世界知識》，弱小民族翻譯工作都在這樣的脈絡下。《世界知識》這次企劃與其它兩誌的長期耕耘和規模無法相比，卻同樣明確地把弱小民族文學翻譯工作的政治意義傳達給了讀者。

四、《山靈》的迴響

如前所述，為了讓〈新聞配達夫〉在日本獲得發表，楊逵把描寫重點從殖民主義對台灣人的剝削，擴大到資本主義在帝國境內對自民族無產階級的壓迫，並強調日、台無產階級提攜的重要性。這樣的宏觀視野台灣讀者無緣看見，只呈現在東京發行的《文學評論》，但它卻透過胡風的翻譯進入了中國讀者眼簾。接下來我們要問，日本和中國的讀者是否讀出了楊逵這一番用心呢？答案是否定的。

在日本方面，《文學評論》雖基於「作為殖民地地下層階級最誠實的代言人」的理由給予楊逵獎項，評審們卻不約而同指出該作品結構有缺失、形象化與藝術性不足、開頭結尾生硬、語言欠佳、完成度不夠等問題。換言之，評審們欣賞它「真情洋溢」、「不矯揉造作」、「有強大吸引力」，卻無法跳脫藝術性與日文中心主義的評價標準。這種矛盾在最支持的德永直身上依然清晰可見：

我們對於殖民地人自己的普羅文學，決不要求和日本普羅文學有同樣程度的意識形態或技巧。這在現階段有不得已的條件限制。我們想知道的

⁴⁶ 譬如胡愈之在〈少數民族問題〉中便批評到：「朝鮮人是日本國內的少數民族，但是日本帝國主義天天在虐殺朝鮮人，別國政府不能加以干涉。因為朝鮮人亡國後，加入日本國籍，朝鮮人的待遇問題，是內政問題。按照現在的國際法，內政問題是不許他國干涉的。」同註 42，頁 71。

是，各色各樣的生活、沒有虛偽的吶喊和希望、被因襲和壓迫所閉塞的生活。當然我們完全沒有因此而輕蔑『藝術性』，與其為迎合日本紳士的好惡而莫名的加以粉飾、或去勢，不如擁有本來意義的藝術性。⁴⁷

德永直越是為楊逵作品的藝術性辯護，就越彰顯日本作家對「殖民地勞農小說」藝術性的期待。評審們透過〈新聞配達夫〉對「台灣普羅文學」寄予期望，他們關心的是作為日本普羅文學支脈的台灣普羅文學的可能潛力與典範建立，而不是作家的創作企圖、政治目的，更不是台灣無產階級的現實困境。

相較於此，日本工人對作品中描繪的台灣無產階級反側更有共鳴。根據張季琳的研究，一位叫片桐旦的工人曾投書表達他的感動：

我是以非常感動的心情閱讀這兩篇小說。我認為與其說是小說，不如說是用「血」敘述的事實。（中略）我結束自己的工作，開始閱讀這兩篇小說，是在早上的七點左右。因為我是從前一天的下午四點左右開始工作，直到第二天的早上七點，所以身心相當疲累。但是，這些小說充分給予我更為強烈的鼓舞力量。（後略）

如果從這些方面來看這兩篇小說的話，不得不說實在是極不成熟的作品。然而對今日尚處低文化階段的我們勞動階級而言，想這樣樸素的作品反而強烈打動我們的心靈。能夠讓沒有教養的我們發奮圖強的，首先就是單純的生活記錄，沒有謊言、沒有欺騙、認真的生活報告。我工作十六個鐘頭後，筋疲力竭的回家時，一接觸到這些文章，就得到非常強的力量。⁴⁸

必須注意，授獎給予殖民地文學，只是日本左翼作家欲挽回普羅文學運動頹勢的策略之一⁴⁹。與工人讀者相較，德永直、中條百合子、武田麟太郎、龜

⁴⁷ 張季琳指出，〈送報伙〉得獎並非所有評審委員一致同意。由於小說中沒有描寫送報伙們從決定罷工到實際罷工的具體經過、勞動者性格不具體、結尾過於樂觀，導致評審有「主觀的幼稚性」、「結尾粗糙」等批判。參見張季琳，〈楊逵〈送報伙〉在日本的得獎及其文學意義〉，收於賴澤涵、朱德蘭編，《歷史視野中的兩岸關係（1895-1945）》（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年），頁116-139。

⁴⁸ 同註47，頁128-129。

⁴⁹ 同註47，頁138。

井勝一郎、藤森成吉、窪川稻子等評審，對小說中描寫的台灣無產者生活幾乎視而不見。簡單說，他們關切的不是台灣作家、台灣普羅階級，而是日本文學支裔，亦即殖民地的勞農文學，以及對這種文學一廂情願的要求和想像。

即使是片桐且，他的共鳴也侷限於主人公在日打工、工人相濡以沫的前篇，而非後篇喧騰一時的台灣農民運動⁵⁰。然而，台灣農民運動的描寫正是台灣總督府禁止之因，也是楊逵、賴和認為這篇小說最有價值之處。楊逵曾提到賴和聞知〈新聞配達夫〉在東京刊出時，「幾乎比我還要興奮。尤其是他最關切的糖業公司逼害農民的那一段描述都沒有剷除，他似乎感到有一點意外。」⁵¹賴和還曾稱讚，這一篇作品勝過楊逵「過去所有作品的總和」⁵²。

那麼，〈送報伙〉在中國的接受和解讀狀況又是如何呢？這個問題，必須回到中國知識界對「弱小民族文學」的認識談起。如前所述，《世界知識》雜誌將弱小民族文學作為一種政治知識引介，那麼左翼文化人士翻譯「弱小民族文學」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1935年11月茅盾翻譯的《桃園：弱小民族短篇集(1)》⁵³出版時，旋遭「新感覺派聖手」穆時英如下批評：

本周出版的單行本計六種：《八月的鄉村》，田軍著，內山書店代售；《死魂靈》，果戈里著，魯迅譯，文化生活社發行；《神、鬼、人》，巴金著，文化生活社發行；《草原故事》，高爾基著，巴金譯，文化生活社發行；《弱小民族小說集》，茅盾譯，文化生活社發行；《短篇集》，靳以著，文化生活社發行。

這六種單行本裡邊有五種是由文化生活社發行的。（中略）文化生活社並不是一個商業機關，據說資本只有四千元錢，在這幾千萬資本的書店都

⁵⁰ 他寫到：「在受到比牲畜更悲慘的虐待、蒙受非人性對待的人群中，依然有美麗的純情和感激。為了讓同事吃飽而將自己的飯食減少、為了朋友而犧牲自己……純潔青年們心靈的堅強團結，豈不正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嘛？我想到我們之間也能有那樣的友情存在，不禁湧上熱淚。」同註47，頁138。

⁵¹ 參見楊逵，〈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孩子〉，《聯合報》，1982年8月10日，第8版。

⁵² 參見楊逵，〈希望有更多的平反〉，收於王曉波編，《被顛倒的台灣歷史》（台北：帕米爾書店，1986年），頁230。

⁵³ 黃源編，茅盾譯，《桃園：弱小民族短篇集(1)》（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

不肯印文學書的時候，這一個小小的出版社竟出了一大批書，這實在不能不教我們替一般平日以提倡文化自命的書店老闆和編輯先生慚愧了。⁵⁴

穆時英肯定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翻譯工作，卻對引介弱小民族文學的茅盾多所諷刺，批評長篇小說《子夜》裝腔作勢，指他為「左傾小兒病患者」：

關於這六本書，茅盾的《弱小民族小說集》是用不到去買的，我們知道茅盾是一個野心不小的人，而《弱小民族小說集》，正是他的把自己造成弱小民族文學專家的工作的一部分。對於這種工作我們似乎不必表示什麼興味吧。⁵⁵

事實上，茅盾在弱小民族文學翻譯工作上的貢獻，在當時和今日都獲得很高的評價。我們必須認識，遭穆時英貶抑的弱小民族文學譯介工作，實際上是民國時期世界文學引介的重要一支，在 1933 年國民黨打壓普羅文學以後，也是左翼文壇的重要突圍策略。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對「被污辱、被損害民族」文學的提倡，始於五四新文學運動時期。《新青年》雜誌從 1918 至 1921 年刊登了挪威、波蘭、丹麥、印度等國家的譯作，包括易卜生、安徒生、泰戈爾……等作家，其中「易卜生號」對中國文壇的影響尤大。主張「魯迅先是一位翻譯家，才是一位作家」的研究者吳鈞，曾在其《魯迅的翻譯文學研究》一書，探討魯迅譯介弱小民族文學的目的。她指出：魯迅在翻譯《域外小說集》曾說明介紹弱小民族文學，是因為「有一種茫漠的希望：以為文藝是可以轉移性情，改造社會」。魯迅自言讀了弱小民族文學以後，「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這許多和我們的勞苦大眾同一運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為此而呼號，而戰鬥」⁵⁶。他為克服語言障礙，「介紹些名

⁵⁴ 穆時英，〈文學市場漫步（三）〉，收於穆時英著，嚴家炎、李今編，《穆時英全集》第 3 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8 年），頁 92-93。穆時英將《桃園：弱小民族短篇集》，誤作《弱小民族小說集》。底為筆者所加。

⁵⁵ 在上述引文之後，穆時英還寫道：「《八月的鄉村》的作者，雖然是新人，但文筆卻老練得很。這本小說寫得很樸素，很老實。一點沒有一般以左傾自命的小兒病患者的裝腔作勢的樣子。雖然並不怎樣了不得，但有勇氣讀《子夜》的，卻不妨把浪費在《子夜》上的時間來讀一讀這本《八月的鄉村》——至少比《子夜》寫的高明些。」，同註 54。

⁵⁶ 魯迅翻譯了許多世界弱小民族文學，例如，芬蘭亞勒吉阿的小說《父親在亞美利加》、匈

家所不屑道的東歐和北歐國的作品」、「尤其是巴爾幹諸小國的作品」，甚至借助世界語譯本進行翻譯，希望讓讀書界知道「世界上並不只幾個受獎的泰戈爾和漂亮的曼殊斐兒（Katherine Mansfield）之類」⁵⁷。

茅盾抱持同樣關心，希望讀者注意五四時期被譯介的名家之外，更多優秀的弱小民族作家。根據宋炳輝的研究，三〇年代以後就屬茅盾主持《小說月報》的時期對弱小民族文學譯介的規模最大、影響也最深。茅盾獲得魯迅、周作人等文學研究會主將的支持，在《小說月報》上刊載大量弱小民族文學譯作，並推出「被損害民族的文學號」，介紹波蘭、捷克、芬蘭、烏克蘭、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希臘、猶太等八個民族的作家作品。三〇年代以後他持續不輟，1934年在《文學》雜誌上推出「弱小民族文學專號」，提供〈英文的弱小民族文學史之類〉、〈現世界弱小民族及其概況〉等導論文章，並介紹亞美尼亞、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希臘、土耳其、阿拉伯、祕魯、巴西、阿根廷、印度、猶太等 17 個國家 26 位作家的 28 篇作品⁵⁸。陸志國也透過統計發現，茅盾翻譯工作的高峰期出現在 1934 至 1935 年，譯作集中刊載於《文學》和《譯文》，並曾獲得葉聖陶的稱讚⁵⁹。

根據上述研究可知，遭穆時英批評的《桃園：弱小民族短篇集（1）》（文化生活出版社），是茅盾弱小民族譯介工作高峰期的作品；同一時期他的譯作〈凱爾凱勃〉也和〈送報伙〉、〈山靈〉一起被收錄於《弱小民族小說選》。譯文叢書，由《譯文》雜誌編輯黃源主編、魯迅指導，為三〇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外國文學翻譯叢書之一。該叢書推出的第一本小說集為魯迅譯的《死魂靈》，第二、四本即是茅盾譯的《桃園：弱小民族短篇集（1）》和胡風譯的《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被收錄在這個重要系列裡，與茅盾譯著有如

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詩作、保加利亞作家跋佐夫的小說《戰爭中的威爾柯》和《村婦》、羅馬尼亞作家索陀威奴的作品《戀歌》、芬蘭女作家明那·亢德的《瘋姑娘》等作品，以及荷蘭作家望·葛覃的《小約翰》，參見吳鈞，《魯迅翻譯文學研究》（山東：齊魯書社，2009年），頁 191-192。

⁵⁷ 同註 55，頁 191-192。

⁵⁸ 宋炳輝，〈弱小民族文學的譯介與中國文學的現代性〉，《中國比較文學》第 2 期（2002 年 4 月），頁 60-61。

⁵⁹ 陸志國，〈審查、場域與譯者行為：茅盾 30 年代的弱小民族文學譯介〉，《外國語文》30 卷 4 期（2014 年 8 月），頁 108-113。

姊妹作，不僅是中國首次對台灣現代文學的介紹，更提高了台灣文學、朝鮮文學的地位和見光率⁶⁰。

弱小民族文學的翻譯與出版在三〇年代中期鼎盛一時，它的意義至少有二：第一，抵抗左翼知識界對國民黨政府言論控制和審查政策。根據張靜廬、陸志國等人的研究，南京國民政府在 1930 年 11 月頒布《出版法》，公告政府對雜誌、期刊等出版品的出版規定、審查和相應的罰則與其他強制措施，又在 1931 年 10 月公布實施細則，對文化出版實行更為嚴苛的管制。1933 年 10 月，國民黨行政院下達「查禁普羅文學密令」，要求各省市黨部以更嚴密的手段查禁書刊，特別打壓普羅文藝書刊⁶¹。1934 年 2 月，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密令查禁圖書 149 種，魯迅、茅盾等左翼人士的重要著作大都囊括在內⁶²。為回應嚴酷環境，上海文藝界在 1934、1935 年出現了所謂「雜誌年」和「翻譯年」的特殊現象。誠如黃源所言，魯迅「靈活地退一步，翻譯沙俄時代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如高爾基的諷刺小說《俄羅斯的童話》和果戈理的長篇小說《死魂靈》，在『圍剿』的天羅地網中建立了陣地。」⁶³前述上海生活書店發行的《譯文》和《世界知識》雜誌，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譯文叢刊」、生活書店的「世界知識叢書」，都是這種背景下的努力。

第二，作為中國近代主體釋放或召喚被壓迫體驗的象徵符號。宋炳輝曾言：

中國主體在近代以來積累了太多被壓迫的體驗需要表達，太多的壓抑感和屈辱感終歸需要釋放，需要在相應的對象身上寄託這一份情感。這種釋放和寄託除了經過創作加以直接表達之外，譯介也是一個有效途徑。

於是，中國人在那些同樣受英、法、德、美等西方強國壓制的弱小民族

⁶⁰ 文化生活社的資深編輯李濟生回顧這一段歷史時，也認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刊印這樣的作品有相當社會意義，參見田一文、李濟生，〈文化生活出版社始末〉，收於李濟生編著，《巴金與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 年），頁 28-29。

⁶¹ 張靜廬，《中國現代出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7 年），頁 171-172。

⁶² 圖書受到審或查禁的原因，在於傳播馬列主義、描寫階級鬥爭、反映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諷刺國民黨政府等。同註 59，頁 109。

⁶³ 黃源，〈對《世界文學》的祝願：紀念《譯文》創刊五十週年〉，同註 36，頁 162-164。

身上，看到了與自己同樣的命運，在他們的文學中，聽到了同樣的抗議之聲，體會到同樣的尋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情感。⁶⁴

從〈送報伙〉在中國初刊時的介紹，我們可以看見「台灣」成了中國被壓迫經驗的一個隱喻和投射：

台灣自一八九五年割讓以後，千百萬的土人和中國居民，便呻吟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之下。然而，那呻吟痛苦的奴隸生活究竟苦到什末程度？卻沒有人深刻地描寫過。這一篇是去年日本《文學評論》徵文當選的作品，是台灣底中國人民被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了四十年以後第一次用文藝作品底形式將自己的生活報告於世界的呼聲。

當然，缺點是有的，例如結構底鬆懈和後半底安逸的感情調子，但那深刻的內容卻使人不能不一氣讀完。據說台灣底華文報紙曾連載過很長的介紹批評，但因為對於讀者的刺激太大，中途曾被日本當局禁止登載。爰特譯出，以使讀者窺知殖民地台灣人民生活底悲慘。讀者在讀它時，同時還應記著，現在東北四省的中國人民又遇著台灣人民的那種同樣的命運了。⁶⁵

引文中胡風雖兩度強調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卻以「殖民地」接受現況，將台灣歸類於世界弱小民族之列，以台灣經驗譬喻東北問題。胡風將台灣當作一個「弱小民族」符號，放在中國主體的外部。台灣問題不是他終極的關心，如何以台灣、朝鮮的奴隸經驗召喚中國讀者的淪亡恐懼，才是他投入翻譯的目的⁶⁶。

《山靈》最早的書評和胡風想法不謀而合，它出現於1936年8月，為中共黨員、左聯委員周鋼鳴（1909-1981）所作。周首先介紹朝鮮自由主義作家張赫宙、朝鮮普羅藝術同盟作家李北鳴和鄭遇尚，並以「台灣的青年前進作家」介紹楊達、呂赫若、楊華，稱許「這些作品的取材都是血底歷史事實」。其次，提

⁶⁴ 同註58，頁68。

⁶⁵ 楊達著，胡風譯，〈送報伙〉，《世界知識》2卷6期，頁320。底線為筆者所加。

⁶⁶ 胡風含蓄地說：「幾年以來，我們這民族一天一天走近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前面，現在且已到了徹底地實行『保障東洋和平』的時期。在這樣的時候我把「外國」底故事讀成了自己們底事情，這原由我想讀者諸君一定體會得到。」胡風，〈序〉，《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頁II。底線為筆者所加。

到這部收集「兩個弱小民族作品」的選集，呈現了「遠東帝國主義底鐵蹄踐踏下過著奴隸生活」的共通點，以及兩地不同的鄉土色彩、習慣和風俗。接著，他以左翼文藝批評介紹各篇，評價〈山靈〉為「殖民地農村經濟的一幅解剖圖」、〈初陣〉是「一篇描寫工場鬥爭的力作」、〈聲〉刻劃「在間島從事農民運動的青農倔強底性格」、〈上墳去的男子〉描寫「投身於朝鮮民族解放的青年們中一段革命與戀愛的故事」，並特別稱讚〈山靈〉、〈初陣〉、〈聲〉、〈送報伙〉四篇。以下是他對〈送報伙〉的介紹：

〈送報伙〉是寫台灣的一個青年，從農村破產流到東京來當送報伙，受著派報所的剝削，和沒收保證金。同時在他的家鄉台灣的農村裡，他父親的田地被殖民地統治者強迫收買，和嚴刑的毒打，而屈辱地死掉，母親也被壓迫的上吊，臨死前把房屋賣掉，望他努力和幫助村人解除奴隸的生活。後來他在日本的勞動者的同情和幫助之下，使他覺醒而成為一個沒有國界的勞動戰鬥員。⁶⁷

周鋼鳴將原本以插敘方式進行的情節重組，從「殖民地農村破產→資本主義財團強制購地→台灣移工在東京遭受剝削→故鄉家破人亡→母親臨終前「掙脫奴隸生活」的期許→日本勞動者的同情支持→無國界勞動戰鬥員的誕生」，突顯作品中資本壓迫、階級鬥爭與跨國提攜議題。他的結論值得我們注意：

全集子都充滿一種憂鬱和憤怒的情感，這是整個民族淪亡的憂鬱，和殖民地奴隸反抗的憤怒。尤其是在這東北四省淪亡，華北五省在敵人槍刺的屠戮下，讀了這些作品，是給我們看到亡國奴的悲慘命運是怎樣。讀了這個集子，同時使我們知道在遠東帝國主義所進行的大陸政策和南進政策之下，在牠的鐵蹄踐踏過的兩個階梯底下的兩個民族淪亡掙扎的慘史。⁶⁸

透過譯本閱讀楊逵作品的周鋼鳴，沒有被語言或藝術性問題干擾其接受。從殖民地奴隸變成國際主義革命者的概括，暗示了台灣民眾對殖民地解放的追

⁶⁷ 周鋼鳴，〈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讀書生活》4卷7期，頁366。底線為筆者所加。

⁶⁸ 同註67，頁365-367。底線為筆者所加。

求，揭開編者胡風不便道明的〈送報伏〉之普羅文學特質，比日本左翼作家準確突出了日台提攜、殖民地解放和無產階級革命等議題。他的書評明顯有為這些披著「少數民族」外衣的作品解密的意圖。然而，由於「東北四省淪亡，華北五省被屠戮」的急迫現況，以及國民黨政府對左派勢力的圍剿，他的論述最後歸結到反蔣抗日之「奴隸論述」底下。楊達亟欲對外傳達的台灣勞農大眾現況，以及藉由文藝運動爭取跨國連結的目的，依然沒有得到回應。

畢竟不是所有讀者都能輕易掌握《山靈》這本翻譯集的隱含之意。1937年，《山靈》的另一篇迴響出現於北平。當時還是大學生的作家張秀亞⁶⁹，讀到〈初陣〉、〈送報伏〉、〈牛車〉中的反壓迫思想時寫道：「作者們的心裏，有一種廣泛而憂鬱的思潮，像斯拉夫人種的俚歌，及民謠中所表現的哀怨一樣，是潛伏在民族氣質根底的悲哀」，她給予這本翻譯集很高評價，認為「我們應該認識他，是先我們一步落難的同族兄弟，遠道奔來，告訴他的一堆悲慘，該拿燃燒著熱情的眼注視他，傾聽他帶淚瓣的故事」⁷⁰。她明顯受到以「少數民族文學」包裝此書的胡風所影響，以異域之眼看待台灣故事，但是卻錯失了胡風以「少數民族文學」、「台灣文學」作為中國淪亡換喻的反蔣、反法西斯話語真意。

綜上所述，日本左翼作家對「殖民地勞農文學」的期待，以及對文體、敘事、結構、日語使用等文學表現上的要求，妨礙他們對作品精神的深入，也無視楊達為揭發殖民主義經濟壓迫所作的努力。閱讀譯本的中國左翼作家們輕易跨過語言門檻，卻因為戴著「少數民族文學」的面具，使〈送報伏〉的普羅文學精神被掩蓋於「奴隸」和「救亡」話語之中。如果說，台灣在周鋼鳴眼中是反帝、反法西斯論述的一個換喻，那麼在張秀亞眼中則是民族主義的符號。

五、結論

〈新聞配達夫〉的得獎使楊達從社會運動者轉型為左翼作家，透過境外刊行策略與自我議題化戰術，從台灣文壇前進日本文壇、又從日本內地回轉台灣

⁶⁹ 張秀亞，生於河北滄縣，1931年考入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今河北師範大學），1934年開始於報刊發表作品。1948年後移居台灣，為重要女作家、「中國婦女寫作協會」會員。

⁷⁰ 張秀亞，〈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大眾知識》1卷6期（1937年1月），頁55-57。

的突圍，不僅使它獲得完整刊出，更提升了楊遠在日本文壇的人際網絡和象徵資本，確立了他在聯繫台、日左翼文壇方面的特殊位置，激發出他從 1935 年末到中日戰爭爆發前以連結境外文藝場域尋求台灣文學出路的戰術。

誠如黃惠禎指出，1935 年 12 月他另創《台灣新文學》時，藉由日本左翼作家抬昇雜誌聲望，使《台灣新文學》扮演日本《文學評論》和《文學案內》台灣支部角色⁷¹。1937 年《台灣新文學》雜誌停刊，6 月楊遠前往日本，9 月回台。黃惠禎指出，他此行乃為爭取將《台灣新文學》寄生在《日本學藝新聞》、《星座》、《文藝首都》等雜誌中⁷²。

筆者則進一步發現，《山靈》的出版還曾使楊遠對中國左翼文藝界寄予期待。參考近藤龍哉有關矢崎彈的研究，得知楊遠與《星座》雜誌的接觸主要透過主編矢崎彈。矢崎彈於 7 月左右前往上海，透過上海日報社編輯長日高清磨、內山丸造及鹿地互等人引介，會見胡風等左聯作家，同時結識蕭軍、蕭紅等東北流亡作家。內山完造、鹿地互在跨國左翼網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眾所周知；罕為人知的是，在日中左翼人士的聯絡過程中，台灣左翼人士也扮演一些角色，而且左聯似乎也曾有意促使台灣作家與東北流亡作家接觸。譬如，在這次日中左翼人士的接觸中，與日高清磨共同協助矢崎彈進行接洽者，即是旅居東京的台灣人資深記者——賴貴富。賴貴富（1904-？），1926 年 8 月起任職東京朝日新聞社，為「台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成員之一⁷³，此次會晤中他扮演的角色和任務不詳，是否和楊遠有關亦不詳。但是，在 1937 年 9 月高達百餘人的進步人士大逮捕中，賴氏在東京遭到逮捕，1939 年 4 月以「違反治安維持法」及「意圖遂行共產國際、日共、中共之目的」等罪名提起公訴。隨後，王白淵也在上海被捕，遣送回台後，判刑 8 年。矢崎彈則因「反戰言辭」及「赴上海與左翼分子聯絡」，以違反治安維持法嫌疑在東京被逮捕。大取締使楊遠進行中的跨國戰略成為泡影，楊遠從此開始了低調的「首陽農園」生活，但它也透露了遭連續取締的這些人之間存在某種關係的事實。

⁷¹ 河原功，《台灣新文學の展開》（東京：研文出版社，1997 年），頁 225。

⁷² 同註 11，頁 20-21。

⁷³ 賴貴富早在 1925 年即曾在楊雲萍主編的《人人》雜誌上，以「賴莫庵」之名發表過隨筆；1935 年以後他則以「陳鈍也」之名，在《台灣文藝》上多次發表文章。

楊達所處的島內位置使他的左翼文學活動和策略，有別於旅居東京的台灣作家，亦即 1935 年由吳坤煌擔任支部長的「台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集團。楊達無法以地利之便參與文聯東京支部活動，卻透過個人創作表現累積的資本，開創島內與日本文藝場域的聯繫，為東亞左翼文化走廊增加一條軌道，並進而引起中國文藝界對台灣文學的注意，因而彌足珍貴。

附表一：《新聞配達夫》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各版本
(1932-1991) / 作者編

作品標題	語文	出版社／所屬書名	時間／卷期	備註
新聞配達夫 (前篇)	日文	台灣：台灣新民報社 台灣新民報	1932年5月19-31日 (之後該報散佚，不可考)	與現存〈新聞配達夫(後篇)〉手稿不同。
新聞配達夫	日文	東京：ナウカ社 文學評論	1934年10月(1卷8期)	與現存〈新聞配達夫(後篇)〉手稿一致。
送報伏	中文	上海：世界知識社 世界知識雜誌	1935年6月(2卷6期)	胡風譯本
送報伏	中文	上海：文化生活社 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	1936年4月(初版)	胡風譯本
			1936年5月(2版)	
			1948年(3版)	
			1951年(5版)	
送報伏	中文	上海：生活書房 弱小民族小說選	1936年5月(初版)	胡風譯本
			1937年3月(再版)	
新聞配達夫 (送報伏)	中日 對照	台北：台灣評論社 中日對照・楊逵小說集	1946年7月(初版) 8月(2版)	胡風譯本
送報伏	中日 對照	台北：東華書局 中日對照・送報伏	1947年10月(初版)	
送報伏	中文	台南：大行 鵝媽媽出嫁	1975年5月	楊逵重譯並改寫本
送報伏	中文	香港：台灣作家選集編委會 台灣作家選集	1976年10月(初版) 1977年7月(再版)	譯本不詳 (待查)
送報伏	中文	台北：台灣鄉土作家選集編委會 台灣鄉土作家選集	1975年?月(初版) 1978年11月(3版)	譯本不詳 (待查)
送報伏	中文	台北：遠景 送報伏：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六	1979年7月	楊逵改寫本
送報伏	中文	高雄：民眾日報 鵝媽媽出嫁	1979年10月	楊逵改寫本

送報伏	中文	北京：人民文學 台灣小說選	1979年12月	胡風譯本？ (待查)
送報伏	中文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台灣作家小說選集(一)	1981年11月(初版)	胡風譯本 (和幼獅版同)
送報伏	中文	上海：上海文藝 中國新文學大系 1927-1937	1984年5月	胡風譯本
送報夫	中文	北京：中國友誼 台灣鄉土作家選集	1984年8月(初版)	胡風譯本？ (待查)
送報伏	中文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楊達作品選集	1985年12月(初版)	楊達重譯並改寫本 (和1975年5月出版之大行版同)
送報伏	中文	香港：文藝風出版社 楊達選集	1986年12月(初版)	楊達重譯並改寫本 (和1975年5月出版之大行版同)
送報伏	中文	台北：前衛 楊達集	1991年2月	胡風譯本 但簡化譯者注解

附表二：文學評論版〈新聞配達夫〉改寫〈新聞配達夫
(前篇)〉之狀況／作者編

台灣新民報（前篇）	《文學評論》版內容	作者修改方式
第 6 回	<p>那一天恰好是星期天，田中沒有課，吃了早飯，他約我去推銷定戶，我們一起出去了。<u>我們兩個成了好朋友</u>，一面走一面說著種種的事情。<u>我高興得到了田中君這樣的好朋友</u>。</p> <p>我向他打聽了種種學校底情形以後，說：「我也想趕快進個什麼學校。……」他說：「好的！我們兩個互相幫助，拚命地幹下去罷。」</p> <p>這樣地，<u>每天田中君甚至節省他底飯錢，供給我開飯賬，買足袋</u>⁷⁴。</p>	底線標示處加筆
第 6 回	<p>「呃！完全記好了。」</p> <p><u>這樣地回答的我，心裏非常爽快，起了一種似乎有點自傲的飄飄然的心情</u>。</p> <p>「那麼，從今天起，你去推銷定戶罷。報可以暫時由田中送。但有什麼事故的時候，你還得去送的，不要忘記了！」老闆這樣地發了命令。<u>不能和田中君一起走，並不是不有些覺得寂寞，但曉得不會能夠隨自己底意思</u>，就用了什麼都幹的決心，爽爽快快地答應了「是！」反正田中君早上晚上還能夠在一起的。<u>就是送報罷，也不能夠總是兩個人一起走</u>，所以無論叫我做什麼都好。有飯吃，能夠多少寄一點錢給媽媽，就行了。而且我想，推銷定戶，晚上是空的，並不是不能夠上學⁷⁵。</p>	底線標示處加筆

⁷⁴ 楊遠著，胡風譯〈送報伙〉，同註 3，頁 75。

⁷⁵ 同註 74，頁 76。

第 6、7 回	<p>「十一份？……不夠不夠……還要大大地努力。這不行！」</p> <p>事實上，我以為這一次一定會被誇獎的，然而卻是這付兇兇的樣子，我膽怯起來了。雖然如此，我沒有說一個「不」字。到底有什麼地方比奴隸好些呢？⁷⁶</p> <p>「是……是……」我除了屈服沒有別的法子。不用說，我又出去推銷去了。這一天慘的很。我傷心得要哭了。依然是晚上十點左右才回來，但僅僅只推銷了六份。十一份都連說「不行不行」，六份怎樣報告呢？……（後來聽到講，在這種場合同事們常常捏造出烏有讀者來暫時渡過難關，可是，捏造的烏有讀者底報錢，非自己掏荷包不可。甚至有的人把收入底一半替這種烏有讀者付了報錢。當然，老闆是沒有理由反對這種烏有讀者的⁷⁷。）</p>	底線標示處加筆
第 7 回	<p>「可是……從這條街穿到那條街，一家都沒有漏地問了五百家，不要的地方不要，定了的地方定了，在指定的區域內，差不多和捉虱一樣地找遍了。……」</p>	改寫，原為兩百

⁷⁶ 同註 74，頁 77。

⁷⁷ 同註 74，頁 77。

附表三：《世界知識》雜誌「弱小民族名家作品」譯介狀況
／作者編

	(國籍)作家／譯者	小說名稱	原刊所附之作者介紹	卷號／時間
1	(印度) Miriem khundkar 伍實(譯)	耍蛇人的女兒	未附	2卷2號 1935年2月
2	(捷克) 加柏克 黎烈文(譯)	期待之島	未附	2卷3號 1935年3月
3	(保加利亞) 伊里耶夫 孫用(譯)	大赦	伊里耶夫(N. Iliev)于一八八二年生于塞夫里耶夫。保加利亞的作家，他的大家所知道的筆名是西利烏思(Sirius)。他的作品有喻言《天堂似的沙漠》，《故事集》，《雜感集》，以譏刺的語句為其特徵。還有戰爭的故事《隨著未死者的腳步》，短篇小說《伊里拿》，在此他記述了他旅行意大利的印象。最近的短篇是《變成沙漠了的天堂》，在很短的時間就再版。本篇是從I. H. Krestanov的《保加利亞文選》的世界語譯本重譯的。(譯者記)	2卷4號 1935年4月
4	(羅馬尼亞) 累爾吉 徐懋庸(譯)	水牛	Fugen Relgis 是羅馬尼亞的名作家，一八九五年生於雅西(Jassy)著有小說《瘋人》、《靜默的旋律》及詩集。大戰後，他編輯Umanitarea雜誌，並致力於人類和平運動。一九二四年，他發表一部偉大的作品，題目是Petru Arbore，他是個人類的內心的熱情的發掘者，是愛與自由的自然法則的遵守者和履行者。(譯者)	2卷5號 1935年5月

5	(台灣) 楊逵 胡風(譯)	送報佚	台灣自一八九五年割讓以後,千百萬的土人和中國居民,便呻吟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之下。然而,那呻吟痛苦的奴隸生活究竟苦到什末程度?卻沒有人深刻地描寫過。這一篇是去年日本文學評論徵文當選的作品,是台灣底中國人民被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了四十年以後第一次用文藝作品底形式將自己的生活報告於世界的呼聲。 當然,缺點是有的,例如結構底鬆懈和後半底安逸的感情調子,但那深刻的內容卻使人不能不一氣讀完。據說台灣底華文報紙曾連載過很長的介紹批評,但因為對於讀者的刺激太大,中途曾被日本當局禁止登載。爰特譯出,以使讀者窺知殖民地台灣人民生活底悲慘。讀者在讀它時,同時還應記著,顯在東北四省的中國人民又遇著台灣人民的那種同樣的命運了。(譯者)	2卷6號 1935年6月	
6	原刊遺佚 (朝鮮) 張赫宙 馬荒(譯)	山靈	不詳	2卷8號 1935年10月 (根據許俊雅教授說法)	
附錄	《世界知識》2卷7-12號,原刊遺佚。				
	參酌世界知識社編《弱小民族小說選》(2),可知佚作如下:				
		國家	作者	譯者	小說篇名
	1	阿爾及耳(Algiers)	K·呂海司	茅盾	凱爾凱勃
	2	烏克蘭	Petro Pauê	屈軼	耶奴郎斯之死
	3	波蘭	薛孟斯茶	許天虹	一撮鹽
	4	希臘	理佐布羅斯	徐懋庸	一個希臘兵士的日記
	5	愛爾蘭	奧法拉蒂	胡仲持	成年
6	阿拉伯	失名	宗融	盎塔拉的死	

參考書目

一、專書

- 大眾時報社，《台灣大眾時報》（台北：南天書局，1995年）。
- 大眾時報社，《新台灣大眾時報：1卷1期—2卷4期》（台北：南天書局，1995年）。
- 上海魯迅紀念館編，《黃源文集》第1、2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
- 下村作次郎著，邱振瑞譯，《從文學讀台灣》（台北：前衛出版社，1997年）。
- 王曉波編，《被顛倒的台灣歷史》（台北：帕米爾書店，1986年）。
- 世界知識社編，《弱小民族小說選·輯二》（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社，1936年）。
- 吳鈞，《魯迅翻譯文學研究》（山東：齊魯書社，2009年）。
- 李濟生編著，《巴金與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
- 周正章，《笑談俱往：魯迅、胡風、周揚及其他》（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
- 河原功，《台灣新文學の展開》，（東京：研文出版社，1997年）。
- 河原功，《翻弄された台湾文学》（東京：研文出版社，2009年）。
- 張赫宙著，胡風編譯，《山靈：朝鮮台灣短篇小說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
- 張靜廬，《中國現代出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
- 郭南燕編著，《バイリンガル日本語文學——多言語多文化のあいだ》（東京：三元社，2013年）。
- 陳芳明，《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略》（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
- 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4卷（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1998年）。
- 黃惠禎，《楊逵及其作品研究》（台北：麥田出版社，1994年）。
- 黃惠禎編，《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4·楊逵》（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年）。
- 黃源編，茅盾譯，《桃園：弱小民族短篇集（1）》（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

穆時英著，嚴家炎、李今編，《穆時英全集》第3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8年）。

賴澤涵、朱德蘭編，《歷史視野中的兩岸關係（1895-1945）》（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年）。

二、期刊論文

朱雙一，〈光復初期台灣文壇的胡風影響〉，《安徽大學學報》第4期（2012年7月），頁10-19。

宋炳輝，〈弱小民族文學的譯介與中國文學的現代性〉，《中國比較文學》第2期（2002年4月），頁60-61。

河原功著，張文薰譯，〈不見天日十二年的〈送報伏〉：力搏台灣總督府言論統制之楊達〉，《台灣文學學報》第7期（2005年12月），頁129-148。

柳書琴，〈『台湾新民報』の右転回：頼慶と新民報日刊初期のモダン化文芸欄〉，《言語社会》第7期（東京：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2013年3月），頁28-46。

柳書琴，〈滿洲內在化與島都書寫：林輝焜《命運難違》的滿洲匿影及其潛話語〉，《台灣文學研究》第2期（2012年6月），頁133-190。

柳書琴，〈臺灣文學的邊緣戰鬥：跨域左翼文學運動中的旅日作家〉，《臺灣文學研究彙刊》第3期（2007年5月），頁51-84。

張禹，〈楊達·《送報伏》·胡風：一些資料和說明〉，《新文學史料》第4期（1987年11月），頁84-88。

許俊雅，〈關於胡風翻譯『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的幾個問題〉，《文學台灣》第47期（2003年7月），頁6-22。

陸志國，〈審查、場域與譯者行為：茅盾30年代的弱小民族文學譯介〉，《外國語文》30期4卷（2014年8月），頁108-113。

黃惠禎，〈楊達與賴和的文學因緣〉，《台灣文學學報》第3期（2002年12月），頁143-168。

趙勳達，〈蔣渭水的左傾之道（1930-1931）：論共產國際「資本主義第三期」理論對蔣渭水的啟發〉，《臺灣文學研究》第4期（2013年6月），頁129-165。

三、雜誌文章

周鋼鳴，〈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讀書生活》4卷7期（1936年8月），頁365-367。

胡愈之，〈少數民族問題〉，《世界知識》1卷2期（1934年10月），頁70-73。

張秀亞，〈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大眾知識》1卷6期，頁55-57。

張明養，〈《世界知識》創刊初期的戰鬥歷程：祝《世界知識》創刊55週年〉，《世界知識》第18期（1989年5月），頁2-6。

無署名，〈消息通〉，《台灣新文學》1卷1期（1935年12月），頁64。

無署名，〈台灣文聯東京支部第一回茶會〉，《台灣文藝》2卷4期（1935年4月），頁24-30。

無署名，〈編輯室〉，《世界知識》2卷1期（1935年1月），頁22。

楊貴，〈當面的國際情勢〉，《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號（東京：大眾時報社，1928年5月），頁12。

楊逵著，胡風譯，〈送報俠〉，《世界知識》2卷6期（1935年6月），頁42-53。

魏晉，〈最近中國文壇上的大眾語〉，《台灣文藝》2卷7期（1935年7月），頁193-194。

四、報紙文章

楊逵，〈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孩子〉，《聯合報》，1982年8月10日，第8版。

五、電子媒體

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來源：<http://www.dachengdata.com/tuijian/showTuijianList.action?cataid=1>，2016年4月27日）

國立台灣文學館，「楊逵文物數位博物館」，（來源：<http://dig.nmtl.gov.tw/yang/index.php>，2016年4月27日）。

楊肇嘉捐贈，李承機主編，「日刊台灣新民報創始初期（1932.4.15-5.31）」數位光碟。